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蔡靖泉.熊渠封立三子为王与楚国江汉基业草创[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6(5):41-49.

熊渠封立三子为王与楚国江汉基业草创

蔡靖泉

(华中师范大学 楚学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西周中期后段,周室衰微,不满周室封楚以卑下爵号“子男”的熊渠自尊为“楚公”,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而占有鄂地的商周古矿冶基地后,封立三子为王,分别镇控新拓的“江上楚蛮之地”。其长子康被立为句亶王,王城或即沮漳河下游东部的荆州阴湘城遗址;中子红被立为鄂王,王城当在今鄂州、黄石及武汉江夏东南一带;少子疵被立为就章王,王城或即沮漳河下游西部的当阳季家湖城址。熊渠封立三子为王,既能保障以铜料为主的战略物资安全输往当时楚国各地,尤其是今鄂西北荆雎山间的楚都丹阳,又致开拓的江汉地区汉西大部及南部滨江地带连接成为楚国势力范围并得以经营和巩固,或许还有让嗣子继位后将首都南迁至古时长江中游枢要——今荆州市区以图更大发展的远谋,从而草创楚国的江汉基业。楚国乃由“辟在荆山”的蕞尔小邦,崛起为雄踞江汉间的南土大国。

关键词:熊渠;三子;立王;基业;草创

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3)05-0041-09

周初封建诸侯,周室念及商末楚先君鬻熊“子事文王”的勤劳,乃封其曾孙熊绎于汉南的今湖北南漳一带,“辟在荆山”而“号为子男五十里”。^①于是,楚人在周代有了立国的合法性和令江汉间蛮夷率服的权威性。

西周早中期,楚人备受周室和诸夏的歧视,周昭王、穆王还相继大举南征。被局限在荆山地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的楚人,只能积蓄力量以待发展时机。

清华楚简《楚居》记载:“熊绎……至禽只、禽𩇛、禽𩇛及禽𩇛,尽居夷屯。”^②《史记·楚世家》则述:“熊绎生熊艾,熊艾生熊𩇛,熊𩇛生熊胜。熊胜以弟熊杨为后。熊杨生熊渠。”自熊绎而至熊渠,六世楚君全居夷屯(当即荆雎山间的楚都,地名夷屯,都号丹阳)而从未徙居,则想必楚人在西周前期犹似被禁锢又时遭侵扰的凤鸟,未能突破樊笼,也无高亢之鸣,期待羽毛丰满而在王纲解纽之际“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收稿日期:2023-04-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楚文化西渐区域的历史发展与文化变迁”(12BZS078)

作者简介:蔡靖泉(1954—),男,湖南东安人,教授,主要从事楚文化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楚辞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① 《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半氏,居丹阳……(武王)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子男之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史记·孔子世家》:“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参见拙文《鬻熊奠基肇业与熊绎受封立国——商末周初半楚史论》,《职大学报》2019年第1期。

② 整理者注:“禽只,《楚世家》:‘熊绎生熊艾。’楚文字‘只’作‘𠂔’,隶书‘艾’形体与之相近,《史记》疑有讹误。……禽𩇛,𩇛当即‘樊’字,《汉书·古今人表》作‘熊盘’,……《楚世家》作‘熊胜’,疑是‘般’(盤)字讹误。……禽𩇛,‘𩇛’从贝,𩇛声,赐之异体。《汉书·古今人表》:‘楚熊錫,盘子。’《楚世家》:‘熊胜以弟熊杨为后。’‘易’与‘𩇛’隶书形体相近,传写讹误,……”按:丹,通“𩇛”;𩇛,通“渠”。夷屯,当即《楚世家》记载的熊绎所居丹阳,夷屯是地名,丹阳为都号。熊绎受封立国在今湖北南漳一带的荆雎山间,莫都于夷水之滨陵屯台地,想必是因念旧怀祖而沿用先公居邑的地名为都号。参见拙文《〈楚居〉所记楚先公事迹的献疑考实》,《江汉论坛》2019年第8期。

《史记·楚世家》述: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郢。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传世有一件三角形援,援面有椭圆形黑色斑块,内端铭刻“楚公蒙秉戈”五字的铜戈,经鉴定为熊渠的遗物,现藏湖南博物院^[1],见图1。据铭文可知,熊渠不满周室所封楚君的卑下爵号“子男”,自尊为“楚公”。楚公熊渠,得周室衰微之天时、山高水长之地利、江汉间之民和,操戈挥师,先征服西边都(今湖北竹山)堵水之滨的强邻庸国^[2],解除远征以开疆拓土的后顾之忧;再沿沮水、漳水南下,降服沮漳河上下游的权国,占据古时长江中游枢要的今湖北荆州市区一带;继而东进讨伐长江中游两岸的杨粤(一作扬越,商周越人的一支),占有商周古矿冶基地所在的今湖北鄂州、黄石及武汉江夏东南一带;然后自称“蛮夷”而公然与周室抗礼,将三个儿子分别封立在新开拓的“江上楚蛮之地”为王。



图1 楚公蒙秉戈

熊渠封立三子为王的史事,也见于《世本》和《大戴礼记》记载。

《世本》记:

熊渠立其长子庸为句亶王。^①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少子疵为就章王。

《大戴礼记·帝系》载:

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为无康,为句亶王;其中之为红,为鄂王;其季之为疵,为就章王。

《世本》《大戴礼记·帝系》和《史记·楚世家》关于熊渠封立三子为王的记载,叙事相同而文字稍异,

当有传抄过程中的通假或讹误。《楚居》未载熊渠封立三子为王的史事,应是此篇重在记述楚公楚王的徙居。

《史记·楚世家》裴骃《集解》“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句:“张瑩曰:‘今江陵也。’”司马贞《索隐》:“《系本》‘康’作‘庸’,‘亶’作‘袒’。《地理志》云江陵,南郡之县也。楚文王自丹阳徙都之。”余知古《渚宫旧事》卷一也述:“熊渠立,封长子康为句亶王,治江陵。”唐宋至明清的经史学家,大都从其说而认定“句亶即今江陵”。^②如其所说,句亶也就是春秋末年至战国中晚期楚国郢都所在地,即古江陵、今荆州市区。句亶当为地名,有同于鄂为地名。《说文》:“句,曲也。”亶,通“袒”“坦”。贾谊《新书·君道》:“《书》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句亶,或许是指因江河交错分割而成的弯曲状平坦地带,也即商周时期今荆州市区一带地貌的形象指称。

地属荆州市荆州区马山镇的阴湘城遗址,位于沮漳河下游东部,西距沮漳河直线约11千米,西南距长江直线约18千米,东南距战国楚故都纪南城直线约14千米,是一处叠压有大溪、屈家岭、石家河、夏商两周文化遗存的重要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3~6]其平面近长方形的古城址,东西长约580米,南北残宽约350米,城外有护城河遗迹。经发掘解剖,可知古城始建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西周时期对城垣有所增高加宽,东周时期逐渐废弃。其西周文化遗存,有鬲、罐、豆、盂等。考古调查者推断:“阴湘城一带可能是楚昭王更城郢以前的郢都,而纪南城则是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偏晚楚国都城。”^[7]从已公布的发掘资料来看,阴湘城遗址的东周楚文化遗迹遗物不多,曾为春秋时期楚国都城的可能性不大;但其城垣在西周有所增修补建,或许就是句亶王为之。疏理相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辨析,句亶王应被封立在沮漳河下游东部的今荆州市区,阴湘城遗址或即句亶王的居邑,见图2。

近现代以来、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句亶非江陵之地的异说。如清末名儒孙诒让以为:“是熊渠三子所封,即其兴兵所伐之地。句亶,即庸。”(《大戴礼记斟补》卷中)。现今一些学者主要通过人

① 庸,当与“康”形近而讹;袒,当与“亶”音近而通。

② 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百九《嘉礼》八十二。

名、地名的文字学、音韵学考证,或认为句亶王的封地近庸,“其地当在钊穴以东、句澁以西”^{[8][9](P9~10)};或断定“‘句亶’就是‘句澁’”,“在‘庸’之东北,位于汉水南岸”,“地当在今丹江口市西北至郧县一带”^[10~12];或以为“长子康所封最远,其封地句蚺即是庸地”^[13];或推论“郧县的辽瓦店子遗址当为熊渠之世句亶王的封地”^[14]。这些说法,显然与西周后期至春秋时期的江汉地区历史情势不合。孙诒让大概以为熊渠伐庸即灭庸兼土,乃在庸地“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可是,楚灭庸是在春秋中期。《左传·文公十六年》详明记载了楚庄王联合秦人、巴人及群蛮灭庸的史事:“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再说,郧县(现为十堰市郧阳区)一带在西周至春秋中期为麇国境域已是史界定论,称熊渠将嗣子封立在麇国境内“进一步控制庸国”则令人不可思议。试想,熊渠时代的楚都在荆雒山间,楚人往西北至麇地需经谷、绞诸国地界,倘若句亶王被封立在郧县一带,其所王之地岂不是一块被绞、麇、庸诸国包围的飞地?又何来为“王”一方的空间?若有变故又怎能保障自身安全?楚公熊渠兴兵伐庸,当经麇地。庸当为荆蛮之国,麇应是濮人之国。国邻族别,麇人恐

怕长期受到强邻庸人的欺压,自然亲善在江汉间和邻国他族的楚人。待熊渠伐庸、假道于麇,与庸为世仇的麇人大概甘愿从属楚国、协助楚师。熊渠征服庸国,庸也与麇一同成了“属楚之小国”(《左传·文公十六年》杜预注)。因此,楚文化也会影响到庸、麇之地的文化发展。辽瓦店子遗址位于郧阳区柳陂镇辽瓦乡境内的汉水南岸二级台地,发现的“西周时期文化遗存包括陶窑一座以及灰坑数座,未发现独立的地层”^{[15](P30)},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发掘者分析,辽瓦店子遗址出土的少量西周陶器可分三期,“第一期遗存的年代应在商周之际至西周早期”;第二期遗存有典型的周文化风格陶器,年代应在西周中晚期;第三期遗存可见春秋早期楚文化风格的陶器,年代应在两周之际。倘若认定辽瓦店子遗址就是句亶王的封地,那么辽瓦店子遗址即使没有城址,也应有高等级墓葬或出土青铜礼乐器和兵器。殊知太史公在《楚世家》中言之凿凿,记“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载熊渠封立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显然,“江汉间”地与“江上之地”的地理概念,太史公区分明确也表述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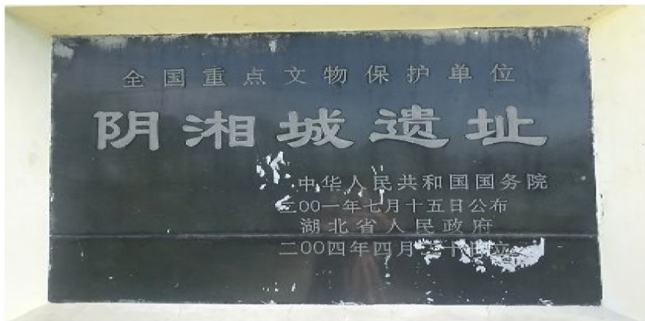


图2 阴湘城遗址保护标志碑

二

熊渠征伐扬越的目的,是“至于鄂”。论者多以为,熊渠所至之鄂即甲骨卜辞、西周金文和《史记》所载承商及周的姁姓鄂国。古籍中有在今湖北鄂州、黄石一带的“东鄂”和在今河南南阳境内的“西鄂”之称,学界曾有鄂国地望在东鄂或西鄂之辩,学者也多曾据禹鼎铭文而以为鄂国在西周中晚期之交已被周厉王灭亡。2007年随州羊子山鄂国贵族墓葬和2012年南阳夏响铺鄂国贵族墓地的发掘^[16~20],方使世人知晓:西周早中期的鄂国地望在今湖北随州一带,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鄂国地望在今南阳境

内,鄂国并未被周厉王扑灭,周室在西周晚期将剿后残余的鄂国贵族迁至今南阳境内安置。由是,学界原来形成的“可以推定鄂国确在江汉汇合处的今湖北鄂城一带”^[21]的主流观点失去根基。近年,一些学者据鄂国考古新发现认为,熊渠所至之鄂就是在今随州的鄂国。^[22,23]然而,着眼楚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来考察,依据楚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逻辑去寻绎,熊渠若在周夷王之世征伐位于今随州一带的鄂国,而且割据鄂国疆土将其子封为鄂王,不仅匪夷所思,而且不合时势事理。分析西周后期江汉地区的形势和楚国发展的趋势,印证周代楚国的相关史料,熊渠所至之鄂只应是史称“东鄂”的今鄂东南鄂州、黄石

及武汉江夏东南一带。张正明早就指出:“这鄂,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是扬越的经济中心”^{[24](P24)};“熊渠……伐鄂,则无疑是看中了那里的铜矿”^{[25](P38)}。诚然,“东鄂”本是商周南土扬越的世居之地,并未成为姁姓鄂人所居之国;今鄂东南发现有多处古矿冶遗址,是商周最为重要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基地;著名的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显示了商周最高的矿冶水平和成就。见图3。熊渠“至于鄂”,就是为了占有扬越所居鄂地丰富的铜矿资源、掌握先进的矿冶技术;因为铜是当时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铜方可富国强兵。



图3 铜绿山古铜矿遗址

旧说“楚子熊渠封中子红于鄂,僭称王,居此城”^①的大冶鄂王城遗址,现已被考古调查发掘证实为东周至汉代的城址。^[26,27]不过,其附近却有多处两周遗址并出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青铜礼乐器。东南距鄂王城遗址仅数千米的武汉市江夏区湖泗街道(原湖泗镇)境内陈月基遗址,出土5件青铜甬钟的年代上限恰与熊渠“至于鄂”的年代大致相当,周围又有多处两周遗址。拙文《鄂国史迹与楚人至鄂》,对熊渠所至之鄂即史称的“东鄂”论证甚详,且据考古发现推断:“熊渠封立中子红为鄂王的居邑或许就是今湖泗镇境内的某处周代遗址,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楚国在‘东鄂’的政治中心在今湖泗镇境内,战国时期楚国在‘东鄂’的政治中心或因水患而迁至地势稍高的鄂王城遗址。”

春秋战国时期,“东鄂”一直是楚国王子的封地,是楚国大力经营的战略物资基地。刘向《说苑》记述了春秋晚期的鄂君子皙事迹,出土战国中期的鄂君启节和包山楚简皆记“噩君”。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之中”而遇“榜枻越人楫楫而歌”,鄂君启节铭记鄂君商贸车船队的行商路线,证实鄂君封地即今鄂州、黄石一带的“东鄂”,也就是熊渠所至之鄂。^[28~31]

三

熊渠少子疵受封之地,《世本》作“就章”,《大戴礼记》作“戚章”,《史记》作“越章”。古今学者或谓传抄讹误,或谓文字可以通假。^②其地望,古今更是歧说纷纭。明儒陈士元《论语类考》卷二谓:“越章,即今德安府云梦县地也。”清儒戴震《戴东原集》卷三云:“或封于夔,或封于越,皆楚之越章耳。”清儒宋翔凤《过庭录》卷九说:“越章亦作豫章……断在当涂之地。盖越之故地,熊渠伐而有之,乃称豫章。”黄锡全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一文中,列举了古今学者的“当涂说”“豫章郡说”“安陆章山说”“唐白河下游说”等多种主张^[32~34],认为所谓“越章”当以《大戴礼记·帝系》记载的“戚章”为据,“戚章”就是楚简记有的楚都“葳郢”,也就是荆州纪南城遗址,“‘戚章王’的封地当在今漳水以东之江陵一带”。以上诸说,多是作文字学、音韵学、历史地理学考证的结论,与熊渠封立三子为王的目的和楚国发展的历史难以切合。熊渠时代,楚人尚未占有今属湖北的云梦、安陆、夔(今秭归为西周夔国地域)一带及唐白河下游(今属襄阳),更未至当涂(今属安徽)、豫章郡(今江西南昌)一带。称“在江陵一带受封为王者,并非‘句亶王’,而是‘戚章王’”,无疑于史情常理难通。古江陵(今荆州市区)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熊渠不将长子、次子封立其地,却将少子封立其地,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倘若格外器重少子,熊渠确立的嗣子及卒后继位者就应是少子疵了。然而,《楚世家》明载:“后为熊毋康,毋康蚤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史实即是:熊渠确立的嗣子本是长子康,长子康不幸早亡。熊渠卒后,中子红继立。

《史记》述先秦帝王世系,多据《世本》,当以“少

①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十二。

② 诸如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七:“戚章,字形之误。”黄怀信等《大戴礼记校注》:“戚,戴(震)校本改‘越’,汪照本从……案‘越’各本作‘戚’。”(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796页);武家璧《“楚季”其人与“楚季钟”的年代》:“‘戚章王’本应做‘戚章王’,与‘蹴章王’相通。”(《楚学论丛》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页)。

子疵为就章王”为是。《说文》:“就,高也,从京、尤。尤,异于凡也。”章,通“漳”。《左传·哀公六年》:“江、汉、睢、章,楚之望也。”《孔子家语·正论》《水经注·江水》《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等引述,“睢”皆作“沮”,“章”皆作“漳。”就章,义即沮漳河之滨的高地。就章得名,犹同句亶,也因地形。

张正明主要作历史学的探讨,曾认为“越章的地望不易指实……以在今湖北秭归县较为可靠”^{[24](P25)},后说明“毋康所王之地句亶……在今江陵。摯红所王之地鄂,在今鄂州……执疵所王之地越章,不易指实,可能在江陵与鄂州之间某处。做这样的布局,想来是为了确保运输红铜的战略通道的安全”。^{[35](P16)}张说意谓熊渠封立三子为王的布局,是着眼于楚国发展的战略谋划,诚然洞达。不过,熊渠封立三子为王的战略谋划和精心布局,恐怕不仅只是确保铜料运输通道的安全,还应是经营和巩固所占江汉地区的汉西及滨江地带的新拓疆土和物质源地,创建楚国发展的坚实基业。既作文字学、音韵学、历史地理学的考证,又作历史学的深入探讨,再参证考古新发现的资料,就章的地望还是可以大致指实。有学者作音韵学的考证,认为“‘就章’‘戚章’就是‘沮漳’。也就是今天经当阳、枝江绕过古纪南城西北,于江陵汇入长江的沮漳河”。^[32]着眼于楚国长远发展的战略谋划,熊渠封子在沮漳河流域为王十分必要。沮漳河是连通楚都丹阳与句亶的要道,其安全比句亶至“东鄂”的铜料运输通道更加重要。沮水、漳水在今当阳市河溶镇两河口汇合为沮漳河,若执疵封地在沮漳河流域,就章的地望就应在今当阳、枝江境内。

2012年,在宜昌白洋工业园区的长江北岸一级台地(原属枝江市白洋镇万福埡村),因工程施工发现西周的铜器和陶器。2015年,万福埡这处面积约56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被发掘,发现灰坑、灰沟、洞坑、窑址等遗迹,出土大量陶器和少量铜器、石器、陶器等遗物。出土的青铜器计有甬钟12件、圆鼎1件和柳叶形剑1件,陶器有鬲、簋、罐、瓮、尊、豆等。发掘简报认定:“万福埡遗址从西周晚期延续到春秋中期,文化内涵丰富……但究其主要文化内涵仍属楚文化范畴。”^[36]出土的1件饰有云纹、凹旋纹和窃曲纹的甬钟,钲部至鼓部铭刻:“楚季宝钟厥孙乃献于公公其万年受厥福。”见图4。发掘简报推断:“其铸造年代为西周中期,而钟体铭文与甬钟铸造年代不同,应该是钟铸造完成使用过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篆刻而成。”关于这批青铜钟鼎的年代,尽管考古专家

有西周早中期和西周晚期的不同意见^[37,38],但经国家相关专家鉴定,“众多意见完全一致:时代为西周中晚期”^[39]。



图4 楚季宝钟及铭文

万福埡遗址的发现及其西周中晚期文化遗存的面世,表明万福埡遗址附近曾有西周中晚期楚国贵族的居邑。李伯谦谓:“万福埡遗址是典型的楚文化遗存,学术界没有争议……其等级虽比不上同时期的大国封国都城,但也绝不会是普通的聚落,由其规模和内涵窥之,亦应是与封国都城相差不太大的重要聚落遗址……笔者猜度周、楚反目,可能与楚人势力陡增、不听中央号令且自封楚公有关。如果成、康时期楚都确在丹淅之会的‘丹阳’,那么至昭王或昭王以后新迁的都城会在何地呢?从时间上讲,万福埡遗址不无可能。”^[38]不过,万福埡遗址的面积虽然不小,但文化层分布零星又不连续,且未发现建筑遗迹,尤其是大型建筑遗迹,猜度其为封国都城遗址尚需考古发现的证实,猜度其为西周昭王时代或其后楚都遗址则目前既缺考古发现的印证又于文献无征。近时又有考古学者论析,由其文化层分布和地理位置来看,“万福埡作为都城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其考古发现“说明西周中晚期楚国是以距离万福埡不远的沮漳河一带作为政治中心”。^[40]

据迄今的考古发现佐证文献记载,切近史实的推断应是,万福埡遗址及其西周中晚期文化遗存与熊渠所封“少子疵为就章王”相关。万福埡遗址出土的一批铜器,不仅显示了熊渠“至于鄂”后楚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和成就,也显示出沮漳河下游在西周中晚期成了楚国又一政治重心,印证了熊渠封立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钟铭的“楚季”,学者或认为是熊渠少子执疵^[41],

或认为是熊严少子季紃(《国语·郑语》作“季紃”,《史记·楚世家》作“季徇”)[42,43],或认为“(《楚居》所载)‘丽季’的直系后裔同样可以称之为‘楚季’……‘楚季厥孙’约当周康王、昭王之世,相对年代为西周早期后段”[37]。就“楚季”含义而言,指的是楚君少子,丽季、执疵、季紃皆可称为“楚季”。就“楚季宝钟”年代而言,除个别论者断为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前段外,多数论者断为西周中晚期或即周厉王时代前后。读“楚季宝钟”铭文,诚如学者阐释:“铭文表明,作钟的器主是楚季,后来由楚季之孙献于其君,即铭文所称的‘公’,从而编钟转归那位楚公所有。”[43]若以为“楚季厥孙”应解释为西周早期后段的楚季“裔孙”,则全无文献记载可印证,且也无考古发现西周早期楚人可以铸造“楚季宝钟”这类大型青铜礼乐器的旁证。季紃之世与“楚季宝钟”的年代大致相合,但史载“季紃是立”“少弟季徇立”,为一代楚君,亦即楚公。试想,楚公季紃之孙将先公宝钟献于当世楚君,似乎于情理难通,况且《楚世家》明载季紃之后继立的四代楚君都是父子承袭的直系胤胄,楚公季紃的宝钟理当为其直系继立的楚公承传而不会落入非嗣子之手。看来,还是没有成为楚君的执疵之孙将祖父宝钟献其当世楚君的推断最合情理,也最具可能性。传世有熊渠铸造的宝钟,熊渠之子被封立为王后当也会铸造宝钟。就章王执疵的宝钟在今枝江境内发现,似乎表明沮漳河下游西部的今当阳、枝江及宜昌市区一带为就章王的封地。“楚季宝钟”出土于灰坑之中,为埋藏青铜器。若楚季即熊渠少子疵的推断无误,那么就章王的都邑也当在万福隘遗址附近,这就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证实。

无论是否能够在万福隘遗址附近发现就章王执疵的王城遗迹,文献记载提供了枝江境内在春秋时期有楚国城邑的线索。《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春秋末年吴师入郢前一天楚昭王出奔,“涉睢,济江,入于云中”。孔颖达疏:“郢都在江北睢东,王走西涉睢,又南济江,乃入于云中。”杨伯峻注:“楚昭王盖由今枝江县渡长江,传说云梦泽跨江南北,此江南之云梦。”枝江县在历史上的隶属和区划多有变故,1996年改为枝江市。此处不论昭王是否渡江而入江南之梦,但昭王涉过沮水奔至旧枝江县境则应无疑。昭王之所以涉沮而至旧枝江县境,当因旧枝江县境内有楚国城邑。旧枝江县境内春秋时期的楚国城邑,或许就是西周执疵的故王城。

当阳季家湖本应是沮漳河故道,在其西岸有楚城遗址。城址东距今沮漳河直线约3千米,西南距

长江直线约15千米,东南距战国楚故都纪南城直线约27千米,南北长约1600米,东西宽约1400米,叠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家河文化遗存之上,主要为东周文化遗存,但也发现有西周晚期遗物。[44,45]遗址所处的草埠湖镇楚城村一带,在1975年前地属枝江县。《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介绍:“季家湖城址是一处非常重要的楚国城市遗址,或认为是楚都丹阳,或认为是楚文王始都的郢城。”[46](P270)据迄今的考古发现和楚史研究,季家湖楚城遗址既不可能是西周楚都丹阳,也不会是春秋楚国郢都,但有可能是就章王的居邑,见图5。



图5 季家湖城址保护标志碑

四

楚公熊渠“至于郢”后,即封立三个儿子分别镇守新拓的楚疆,且冠以与周王等齐的王号。明儒王道焜、赵如源辑《左传杜林合注》卷一谓:“熊渠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此僭王之始也。”楚人勇于躐等破格,即由熊渠奠其精神之基,开其传统之源。

“伐庸、杨粤,至于郢”后立三子为王,可谓“熊渠一生所曾作出的最重大的决策,以及所曾建树的最辉煌的功业”[35](P45),对楚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影响深巨。

顾铁符论析:“‘立长子康为句亶王’的句亶,和郢是在同一地区范围之内。熊渠在扫荡江汉平原的前前后后,对长江、云梦之间关系,作了详细考察,意识到它对楚国发展前途的重大作用。熊渠要他的长子坐镇在这里,是为二百年后迁都立下了基石。”[47](P41~42)诚如其说,熊渠兴兵征伐和封立三子,是着眼于楚国发展前途的远大图谋和战略举措。

《史记·货殖列传》谓:“江陵故郢都,西通巫、

巴,东有云梦之饶。”班固深以为是,在《汉书·地理志》中引述。其不仅是西通巴蜀、东达吴越的咽喉,而且是北上可转溯汉水而入中原、南下可济涉长江而抵五岭的要津。加之东、南有云梦、洞庭的富饶物产,西、北有山林、平原的丰裕资财,其足以成为天下都会和重镇所在的胜地。因此,处于东西和南北水陆要道之交叉点上的古江陵、今荆州市区,实为长江中游的枢要和锁钥。西周推行宗法制度,统治者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楚国王位继承制度……仍然行的是周王朝一脉相承下来的传嫡立长。”^{[47] (P60)}熊渠将嫡嗣长子康封在古江陵为王,表明了他对今荆州市区的战略地位有着明晰的认识,对楚国的发展前景有着长远的谋划。立长子康为王居句亶,实际上在今荆州市区建立了当时楚国的副都。或许,熊渠已有让长子康继位后将首都从今鄂西北南迁至今荆州市区的打算,因为莫都在今荆州市区才便于遥

控在今鄂东南的铜矿资源,才便于楚人东进西往、北上南下地发展。只是天命未可预料,长子康早死,熊渠卒后继位的是封立为鄂王的中子红,加之周厉王暴虐慑楚、周宣王“中兴”伐楚,西周晚期的楚君未敢有实现先公熊渠意图的作为,今荆州市区成为楚国王畿也延迟到了东周。

执疵为王之地在沮漳河下游西部,可以控制今鄂西南大片地域,融合土著的濮人、荆蛮并防范巴人西来侵扰,保障丹阳至句亶的沮漳河通道安全,同时又与兄长毋康为王之地连接成片。句亶王的疑似都邑阴湘城遗址与就章王的疑似都邑季家湖城址间隔沮漳河相望,直线距离仅约 13 千米,互为照应而成犄角之势,见图 6。熊渠将长子和少子皆封立在沮漳河与长江的交汇地带,一东一西共同镇守北上南下、东进西往的战略枢要,可谓布局周严,谋虑深远。



图 6 阴湘城遗址与季家湖城址位置

沮漳河中下游本为商代西周的权国据有,考古发现已有印证。^[48, 49]熊渠封立的句亶王、就章王所王之地,当含熊渠割占的权国疆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商周的国家大事,就是祭祀和兵戎。祭祀需要青铜礼器,兵戎需要青铜兵器。“熊渠封其中子红为鄂王”,占有当地丰富的铜矿资源,掌握当时先进的矿冶技术,也就有了富国强兵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熊渠封立三子在“江上楚蛮之地”为王,楚人也

开始悉心经营长江中游两岸及江汉平原腹地。西北距楚国鼎盛时期的楚国首都葢郢(即荆州纪南城)约 50 千米的龙湾遗址,地处古云梦泽中的今湖北潜江龙湾、张金两镇境内,南距长江 50 千米,北临汉水 35 千米,面积约 108 平方千米。遗址内不仅发现始建于春秋晚期楚“章华之台”“章华之宫”遗迹,还发现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晚期的楚文化遗存。发掘报告认为:“龙湾遗址面积如此之大,时代如此之早,延续时间如此之长,规格如此之高,必定有其深刻的历史

背景。据《史记·楚世家》记述……其一,熊渠三子均封在‘江上楚蛮之地’,‘江’即长江,‘楚蛮之地’即楚国领土,说明早在公元前 900 多年的周夷王时,楚国已占据了夔(秭归)至鄂(鄂州)的长江中游地区。其二,‘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且‘立长子康为句亶

王’居江陵,长子是王位继承人,说明熊渠的统治中心在‘江汉间’,长子康的都城在‘江汉间’的‘江陵’。”^{[50](P461)}其说未必都确切,但以考古资料论证楚国发展的战略和历程,则大体符合史实。



图 7 龙湾章华台基址

开疆拓宇既为获取云连徒洲(古云梦泽)的丰富物产,更为获取东鄂之地的江南铜料。熊渠虽然没有略及汉东而尽取江汉间地,却使江汉地区的汉西大部及南部滨江地带连接而成楚国的疆域或势力范围,使长江中游丰富的战略资源——铜矿成为楚国的禁脔,封立三子为王镇控要害而草创楚国的江汉基业。楚国乃由“辟在荆山”的蕞尔小邦,崛起为雄踞江汉间的南土大国。

《楚居》记述:“畬徙居发渐,至畬朔、畬塾居发渐。”^①熊渠徙居的发渐,可能是他率师出荆雎山间沿沮、漳南下的驻邑,或在沮漳河下游的今荆州市区某地。熊渠长子康和中子红也随父从征,由夷屯(丹阳)徙居发渐。地名发渐,传世典籍不见记载。发渐当本为邑聚,熊渠驻蹕并予以命名。或许,熊渠本意是将来以发渐为基址建立楚国新都,命名即表达了希冀楚国发旺渐盛的愿望。又或许,发渐的地望就在纪南城内外。1981 年试掘的纪南城西北隅摩天岭遗址,就发现有西周晚期文化遗存。试掘简报总结:“1.西周晚期文化层所出土的陶器组合鬲、孟、豆、盆、瓮与纪南城内外东周时期陶器组合关系相同,同时

也是这时期楚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组合关系。2.在陶器的形制方面……都与东周时期楚文化中出土陶器的制作风格基本上是一脉相承……通过对摩天岭遗址文化属性的分析,该遗址属楚文化范畴……该遗址似为西周晚期楚人的一处居民区。”^[51]倘若推测切实,纪南城成为楚国鼎盛时期的首都,正是熊渠夙愿的实现。

尊称“楚公”,兴兵开疆,封土立王,熊渠无视王权、抗礼朝廷、侵犯诸侯、为所欲为的举动必为周室所不容。周厉王即位,便有南征伐楚意图。《楚世家》仅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今本竹书纪年》载,厉王元年,“楚人来献龟贝”。此事若实,那么想必厉王即位当年就大张伐楚立威的声势,熊渠明识时务而主动纳贡称臣,并且除去三子的王号,消解了厉王的伐楚意图。据金文资料显示,本为周室倚重的汉东鄂国大概不满厉王暴虐,竟然率领淮夷和东夷在南土和东土大肆侵伐。厉王震怒,派遣精锐的西六师、殷八师南征伐鄂。熊渠忌惮暴虐的周厉王伐楚,明智地自行去掉封立三子的王号。不过,王号虽去,三子的封地仍在,新拓

① 《楚居》整理者注:“畬朔当即《楚世家》熊渠长子康,又称毋康。”塾,同“塾”。

的疆土未失,熊渠草创的江汉基业也在西周晚期得以巩固。

参考文献:

[1]高至喜.“楚公冢”戈[J].文物,1959(12).

[2]蔡靖泉.庸人·庸国·庸史[J].江汉论坛,2010(10).

[3]刘德银.阴湘城古城址发掘获重大成果[N].中国文物报,1996-11-24(2).

[4]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阴湘城东城墙发掘简报[J].考古,1997(5).

[5]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市 1995 年发掘简报[J].考古,1998(1).

[6]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

[7]江陵县文物局.江陵阴湘城的调查与探索[J].江汉考古,1986(1).

[8]赵逵夫.屈氏先世与句亯王熊伯庸[A].中华书局编辑部.文史(第二十五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5.

[9]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0]黄锡全.楚地“句亯”、“越章”新探[J].人文杂志,1991(2).

[11]叶植.试论楚熊渠称王事所涉及到的历史地望问题[A].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12]曹天晓.《史记·楚世家》“三王”封地考[J].文教资料,2016(34).

[13]段渝.西周时代楚国疆域的几个问题[J].中国史研究,1997(4).

[14]黄凤春.郢县辽瓦店子与楚句亯王——楚熊渠分封三王地理的检讨之一[J].江汉考古,2010(2).

[15]傅玥.长江中游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

[16]随州博物馆.随州出土文物精粹[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17]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J].文物,2011(11).

[18]方燕明.2012 年度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J].华夏考古,2013(3).

[19]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馆铺鄂国墓地 M1 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9(4).

[20]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南阳夏馆铺鄂国墓地 M5、M6 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20(3).

[21]李学勤.论周初的鄂国[J].中华文史论丛,2008(4).

[22]陈树祥,黄凤春.楚封鄂王、鄂君与鄂王城之地望辨析[A].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学论丛(第二辑)[C].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23]黄尚明.从考古新材料看鄂国的历史变迁[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4]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5]张正明.秦与楚[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6]大冶县博物馆.鄂王城遗址调查简报[J].江汉考古,1983(3).

[27]陈树祥,席奇峰,余锦芳.大冶鄂王城及周边遗存考古工作回顾和相关问题的思考[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6).

[28]罗运环.论鄂君子皙之鄂[J].鄂州大学学报,2009(3).

[29]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A].谭其骧.长水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0]黄盛璋.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J].安徽史学,1988(2).

[31]刘和惠.鄂君启节“鄂”地辨析[A].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九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2]刘信芳.楚都丹阳地望探索[J].江汉考古,1988(1).

[33]何光岳.“越章”考[J].江汉论坛,1984(10).

[34]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35]张正明.楚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3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宜昌博物馆.湖北宜昌万福埡遗址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6(4).

[37]刘彬徽.楚季编钟及其他新见楚铭铜器研究[A].陈建明.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九辑)[C].长沙:岳麓书社,2013.

[38]李伯谦.宜昌万福埡遗址发掘引发的思考[J].黄河·黄土·黄种人,2018(2).

[39]宜昌博物馆.宜昌万福埡编钟出土及遗址初步勘探[N].中国文物报,2012-9-28(8).

[40]张昌平.论西周时期楚国的政治中心——从宜昌万福埡遗址谈起[J].江汉考古,2021(6).

[41]武家璧.“楚季”其人与“楚季钟”的年代[A].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学论丛(第二辑)[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

[42]郭德维.楚季宝钟之我见[J].江汉论坛,2012(11).

[43]李学勤.试谈楚季编钟[N].中国文物报,2012-12-07(1).

[44]湖北省博物馆.当阳季家湖楚城遗址[J].文物,1980(10).

[45]高应勤.春秋楚郢与季家湖古城[J].华中建筑,1992(1).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两周卷[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7]顾铁符.夕阳当稿——历史考古述论汇编[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

[48]王毓彤.江陵发现西周铜器[J].文物,1963(2).

[49]李健.湖北江陵万城出土西周铜器[J].考古,1963(4).

[50]湖北省潜江博物馆,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潜江龙湾:1987~2001 年龙湾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51]湖北省博物馆江陵工作站.江陵县纪南城摩天岭遗址试掘简报[J].江汉考古,1988(2).

责任编辑 刘春丽 E-mail:157476703@qq.com